

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 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殒落

曹大为

康乾时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此后经历大规模农民战争扫荡以及鸦片战争殖民主义炮火轰击，帝国一蹶不振，不复再现昔日辉煌。传统社会内部危机周期性发作，以及统治者昏庸腐败显然是导致这次衰变的重要原因。不过这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以往历代虽屡经兴衰升沉，却大体保持向上发展势头，并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康乾之后的衰变却使帝国彻底沦入万劫难复受侮挨打的危局。如所周知，明清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飞跃，相继进入近代工业文明轨道，而中国在世界范围由先进转为落后的变化也恰恰发生在明清之际。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否存在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可能？明清社会何以未能顺利向近代工业文明转轨？这应该是诠释处于中国古代鼎盛高峰的农耕文明迅速在世界潮流中殒落原因的关键。

一、农耕文明的鼎盛与高度成熟

明清时期的盛极而衰，是在世界范围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事实上，这一时期在中国自身传统农耕文明轨道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明清两朝鼎盛时期，出现了社会经济全面高涨的局面。宋应星《天工开物》和徐光启《农政全书》反映明代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天工开物》广泛涉及约30种工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大面积扩种双季稻，引进推广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加上广泛植棉，使民众衣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有可能提供更多商品粮，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为农业人口流向手工业部门创造条件。明清时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对传统农业结构有所突破。在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充足原料的同时，也发展了经济作物自身的商品化倾向。正是在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民间手工业突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显著。明中后期江南一些城镇出现专事手工艺生产的“倚织为命”的机户^①，如濮院镇有所谓“以机为田，以梭为

^①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八〇、一八七、三八〇。

未”的“机业之家”^①，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缦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②，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③。这种经济作物与粮食、手工业与农业、手工业生产地区和原料产地之间社会分工的扩大，使各自的产品相互成为商品，彼此成为等价物，并因此形成市场，莫立起破坏自然经济、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明中叶以降商品流通扩大，民间贸易活动空前活跃。不但在著名的手工业生产地区如湖州“各直省客商云集，里人贾鬻四方，四时往来不绝”^④，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货云集”^⑤，而且形成一些集散全国各地产品的重要集市场地。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其货来自四方者”，不但有诸多生活资料，生产原料及生产工具也占有相当大比例，其中棉花、生丝、棉布、绸缎、纸张、烟草、蔗糖、染料、油料、木材、锡、铁、铜、铁器、铜器、农具、磁器、漆器以及其它手工艺品，“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⑥。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集中产地对粮食的需求和依赖，还促进了部分粮食的商品化。盛产棉布的松江、嘉定一带，“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⑦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明中后期广泛使用白银，市场上的商品普遍用银计价交易，万历年间“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⑧，福建地区甚至“虽穷乡亦有银秤”^⑨，贵金属成为通行的十足的货币。因白银广泛流通，供不应求，嘉靖、万历年间通过海外贸易流入大量白银，沿海漳州、泉州一带已通行进口的西班牙银元。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用银计算劳动力价格，计时或计件支付佣金。货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提供方便，刺激、推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⑩同时，白银也成为商人、手工场主积累财富的手段，便于于资本集中。明中后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商人数量大大增多，他们拥有庞大资本，合伙经商，在各地设立会馆，组成商帮，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⑪，不再经营土地。他们主要从事贩卖，或贱买贵卖，或长途贩运，大规模批发。有的还兼营高利贷、典当或开设钱铺、兑店及牙行经纪等金融机构，并形成会票制度。有的甚至操纵金融，囤钱取利。也有个别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部门，加工谋利。如有的闽商“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⑫，在湖州买丝，至芜湖染色，然后运到福州织造。还有一些江南富商

① 胡琢：《濮镇纪闻·风俗》。

② 万历《秀水县志·市镇》。

③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

④ 乾隆《湖州府志》。

⑤ 《濮镇纪闻》。

⑥ 《铅书·食货》。

⑦ 《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

⑧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钱法议》。

⑨ 《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

⑩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

⑪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⑫ 王世懋：《闽都疏》。

大贾“贸丝织缁绮,通贩贸易”^①,购来原料,直接加工成商品,再行贩卖。虽然从总体看,这种情况还较为零星罕见,但却萌发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趋向。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工商业城镇兴盛。明中后期在运河沿线、东南沿海,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又陆续兴起一批工商业城镇。江西景德镇就是至明中期始发展成制瓷手工业城市,隆万时,“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②。这些城镇大多是因为拥有特种手工专业以及商业往来频繁而兴盛,成为某种手工产品和原料的集散地,并因此聚集众多牙行、商贾和行会。如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攀万金而来,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矣”^③,嘉善的千家窑镇亦“民多业陶,甍植繁兴,贸迁日伙”^④。仅江南苏、松、杭、嘉、湖5府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镇市即达30多个。而且这批市镇大多于明中后期以降新建或扩充兴盛。迅速增加的人口,主要为外来的商贾、手工业者和定居从业的流民。大批中小商业城镇的兴起,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兴盛的重要标志,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更广阔的场所,推动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兴旺。以上所述显然不同于自给自足情况下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到集市出售;而且多为民营,有别于直接为满足皇室贵族奢侈享受和满足官府特需而指派、组织进行的生产。

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兴盛,除表现在工具、技术、产品质量以及行业种类、规模、产量均较前提高外;还突出反映在民间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取代官办工场、作坊,占据了主导地位。嘉靖万历时期的民间私营纺织业已经发展成江南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多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商人执引买盐“与灶丁相市”^⑤和“置私灶私池以私煎”^⑥向民营变化的迹象。

明清农耕文明的高度成熟主要表现在上述生产力、生产关系、产业结构等量与质两个方面的提高与变革。明清国力强盛,则突出表现在耕地面积扩大和人口增长。明初耕地面积为八亿五千万亩,清高达十亿亩左右,为此前历代之最。明代最高人口数字为6330多万,清乾隆六年(1741年)达1.4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更增至4.1亿多。清前期主要通过发展生产、鼓励多种经营对付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大批被排挤出耕地的过剩“游民”流入市镇以副补农,或向山区、边远地区移民拓垦。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清前期的大一统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历代未曾达到的。就综合国力而言,明清盛世较历代皇朝明显提高,臻于鼎盛,在亚洲以至世界仍属头等强国,至少明前期在世界范围仍保持领先地位。即使康乾时期,也因“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史无前例的发展高

① 《陆尚宝遗文·友松胡翁墓志铭》。

② 王世懋:《西酉委谭摘录》。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

④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

⑤ 《续文献通考·征榷考》。

⑥ 《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庞尚鹏:《清理盐法疏》。

潮”，而“以其生产以及内部交易的数额之巨而身居世界民族的首位。”^①

明清鼎盛局面的出现，是农耕文明高度发展成熟的结果，与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以及国家政策调整、制度更新密不可分。明初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和明中叶工匠纳银免役、放宽对民间手工业、商业控制等政策调整，以及一条鞭法“视田如陷阱，是以富者缩资以趋末”^②的导向，是这一时期得以突破传统产业结构，刺激经济作物专业区、民营手工业、商业长足发展的重要前提。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的推行，大大放松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则是传统社会赋役制度成熟的标志，体现了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变革。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孕育出主要通过运用生产技术和调配劳动力等环节加强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的新型经营地主；从手工场主、包买商中转化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劳动组合中的早期“资本家”。此类深刻变化表明，明清时期的传统社会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内在动力与活力，新社会的因素正在农耕文明高度发展成熟的基础上萌发生长。

二、工业文明萌动的趋向

明中后期局部地区手工业部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西方显露资本主义曙光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动曾程度不同地在东西方同时显现。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中国社会能否自行发展成资本主义提出质疑，视“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为伪命题。并进而对这一研究中的中国情结和以西方模式为标准裁断中国历史进程的研究范式提出批评。需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是指包括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一种社会形态，如顾准先生所说，“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③马克思曾郑重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看成是“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④至于“生产关系”，则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的形式。本文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必然要发展成资本主义的理论预设出发，而是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就生产关系本身性质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萌芽的概念。

为购买劳动力增殖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和自由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前提。明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雏形从江南等商品经济、民营手工业繁盛的市镇破土萌发，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与必然。据《明神宗实录》、乾隆《苏州府志》与隆庆元年（1567年）蒋以化《西台漫记》等文献记载，“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且有织工、缎工、纱工、车匠等细致的分工，说明生产已具备一定规

①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② 《隆庆实录》卷七。

③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0页、130页。

模,具有较高技术水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的描述则表明,这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大户张机为生”,靠手中掌握的资本、生产资料购买劳动力,剥削增殖财富;而工匠“趁织为活”,“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说明工匠完全脱离土地,失去任何生产资料,唯靠受雇出卖劳力为生。主雇之间主要是“计日受值”的商品货币关系,雇工“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且“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表明雇工法律上人身自由。如雍正十二年《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所载,“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工匠分“匠有常主”和临时工两种,每日黎明按工种专长分立玄庙观、花桥、广化寺桥、濂溪坊等处“听大户呼织”,显示当地已形成劳动力市场。资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和出卖劳动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彼此以平等的商品所有者的资格”^①在这些市场相遇,产生出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另如江西景德镇,“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②,内中分工极细,“共计一杯,过手七十二,方成成器”^③。万历年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④,长年受雇者按年或季发钱,临时雇工按月或计件发给工价。这种把分散的小生产者集中起来分工协作、社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民营劳动组合,与传统官办手工工场和民间小手工作坊相比已发生质的变化。如马克思所说,“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⑤

明中后期以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已经不是孤立的偶发现象,而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数量,具有一定连续性和导向性。在一些弃用资本主义萌芽概念的学者那里,似乎同时存在着贬抑这一变异的倾向。笔者以为,不能因为对传统的理论框架与概念运用持异议,而自身又未能建构起相应的解释模式和概念体系,便因名废实,对明中后期发生的重大变异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明中后期在生产关系、劳动组合方面发生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重大变化,毕竟是清晰可辨的事实。这种生产关系方面的深刻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变动的产物,同时必然反过来对包括生产力、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在内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据实确认这一变异,乃是把握那一时代的历史特点、进一步探讨研判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演变和社会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工业文明是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机器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形态。其主要特征大致表现为工业化、都市化、科层化、法制化、社会阶层流动化、民主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非农业生产人口比例大幅增长、非生命动力资源比率大幅提高、经济持续增长等等。这些特征亦可视为驱动传统社会向工业文明转轨的重要因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则是推进大规模工业化的杠杆。中国自宋代迄于清前期,在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工业化、商品经济化、货币化、城市化等方面遥居世界领先地位。如法国学者贾克·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所述,当时中国“现代化的程度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7页。

②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八。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土延》。

④ 光绪《江西通志》卷四九。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58页。

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亚当·斯密则在1776年指出，当时中国仍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19世纪初，在世界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据了6个。清代集市中心的总数则在4万处左右。明中后期至清前期200多年间，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中国。拥有一流城市和最为密集、完善市场网络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地区。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畅达的通讯、运输系统，有效的组织调动人力、财力资源的行政机制，早已使中国的“政治设施在结构上发展到与现代化社会的政治大体相当的程度”^①。科举选官、捐纳、土地买卖以及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则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广泛机会。国子监、府州县学、书院、义学、私塾等各层级教育渠道的完备，以及书坊刊刻印刷业的繁盛，使明清文化教育水平和识字率居世界前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社会上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万历中期城镇市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遍及全国各地，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织造太监孙隆苛税盘剥，“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一呼响应，毙（其参随）黄建节于乱石之下，付（当地爪牙）汤莘等家于烈焰之中……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烧，殴死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及汤莘等被责枷示，一挥而散。”^②万历三十一年北京西山煤矿窑工、脚夫和部分窑户反对宦官征商，结队至京城示威，一时“填街塞路，持揭呼冤”，竟至“倾动畿甸”^③。一些手工工匠还以增添工价为由“齐行叫歇”。这种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十分罕见的现象一方面反映明清官府对工商业摧残和对市民压迫异常沉重，同时也标志市民工商阶层作为独立的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明清之际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重科学、讲实际，高扬断义逐利、经世致用的主张，以“负万死不回之气”^④的反传统精神，“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⑤，掀起一场批判旧世界、除旧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猛烈抨击“存天理，去人欲”的虚伪冷酷诫条，宣称“私欲之中，天理所寓”^⑥，充分肯定作为人本能要求的情感欲望和私利的合理性；反对用德礼刑政把“千变万化活泼之理，而执之以为一定不可易之物”，粗暴地“强而齐之”^⑦，要求顺应“自然之性”，“各从所好，各骋所长”^⑧，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在政治领域，指责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标榜治天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⑨，提出用“各得其私，各得其利”为原则的“天下之法”，取代“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以约

① 罗致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〇。

④ 袁宗道：《白书斋类集》卷二二。

⑤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〇。

⑥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六。

⑦ 李贽：《明灯道古录》卷上。

⑧ 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⑨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束帝王的“人治”^①。而郡县学官对地方官则可“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②，以“众治”取代“独治”^③。这种要求个性解放、民主、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是对君主专制、纲常礼教猛烈的亵渎和撕裂，为古代中世纪漫漫长夜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晚明还涌现了李时珍、朱载堉、徐光启、徐弘祖、宋应星等一批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科学巨匠。李时珍定稿于1578年的《本草纲目》，以无机界水、火、土、金石；植物界草、谷、菜、果、木以及服器；动物界虫、鳞、介、禽、兽，终至以人，凡三个层面十六部，“从微至巨”、“从贱至贵”排序分类^④，涉及医学、药理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结晶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明显含有近代生物进化思想，受到达尔文高度重视，其中有关资料曾被达尔文论证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时所引用。朱载堉1581年创建十二平均律及其计算原理——“新法密律”，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人们两千年的实现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被李约瑟誉为“虽然远离欧洲，但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⑤宋应星1637年写成的《天工开物》先后被译成日、英、德、法、意、俄等多种文字，在世界科学技术从古代中世纪传统向近代科学转变的潮流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徐弘祖崇祯末年所著《徐霞客游记》在许多方面，例如对火成岩、地热现象和喷泉的描述，流水对岩石的侵蚀作用，植物对气候的依赖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他对石灰岩地貌进行了大面积广泛考察，早于欧洲同类性质的调查研究一个多世纪。李约瑟评价他的《游记》，“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⑥

晚明以降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拜金逐利、“锱铢共竞”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⑦，“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⑧。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真可谓“人为铜钱，游遍世间”，“求人一文，跟后擦前。”^⑨一向备遭困辱鄙视的商人吐气扬眉，发出“市井贱夫，最有理者”^⑩的呼喊，就连雍正帝也无可奈何地感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⑪传统的尊卑长幼等级秩序受到金钱观念冲击，“奴富至数百万，初缙绅皆丑之，而今则乐于为朋矣，即地方监司亦多与往来，宴饮馈遗，恬然无复廉耻之色”^⑫。逐金竞富之余，社会上普遍追求奢侈享

① 《明夷待访录·原法》。

② 《明夷待访录·学校》。

③ 顾炎武：《日知录·爱百姓故刑罚中》。

④ 《本草纲目·凡例》。

⑤ 转引自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页。

⑥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2页。

⑦ 《歙县志·风土论》。

⑧ 康熙《西安县志》卷六。

⑨ 朱载堉：《山坡羊·钱是好汉》。

⑩ 傅山：《圣人为恶篇》。

⑪ 《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刘于义奏折。

⑫ 任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六。

乐,“厌常喜新,去朴从艳”^①,蔚成风气。文学领域世情小说繁荣,一反唐宋主要以官僚士大夫文人为主人公的传统,商人、机户、手工工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也堂堂正正登上艺术殿堂。其中有的歌颂商人追求金钱、海外冒险的理想;有的描绘手工工匠之间的友谊和真诚互助的新型职业道德;尤其对下层市民爱情生活的描述,突破传统道德观念,宣扬蔑视金钱等级、贵在知心互重的自由爱情、婚姻观和对张扬人格、人性的追求,展示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社会心态和行为特征。

明清之际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诸种矛盾交织、充满了希望和苦痛的“掀翻天地”^②的时代,是需要和产生了一批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巨人的时代。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这些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诸种内在关联因素的同时涌现并非偶然,它表明烂熟的农耕文明母体并非万古不变,新因素的萌芽已经在为产业革命的启动准备条件。如果我们把上述诸种因素放置在唐宋以来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便不难发现,其间持续发展、日趋成熟的轨迹历历可辨。明中后期加速启动,出现飞跃,即使清初的逆转和满族贵族统治带来的某些消极因素也未能完全扭转这种趋向。至鸦片战争前,商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远程贸易增多,工商市镇进一步发育成长,除丝织、棉纺织、印染、制瓷、冶铁业外,又在制盐、制茶、制糖、制油、制烟、酿酒、造纸、印刷、铜矿采冶、采煤、木材采伐、沙船运输乃至农业生产等广泛领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③。四川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10月21日“同盛井约”和嘉庆元年(1796年)12月17日“天元井约”,反映其劳动组合已带有现代股份制的特征。对早期近代化必须具备的诸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历史上、特别在明清时期发展趋势纵横两个向度进行的考察,表明明清时期,确切点说自明中后期至鸦片战争前,已经进入产业革命或工业化的准备阶段和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过渡阶段,即从农耕文明中分离出迥异于传统模式的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异,这些变异的发育成长带有向工业文明演进的鲜明趋向。

三、社会转型的障碍与帝国的殒落

社会形态更新是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思想文化诸层面整体互动的结果。处于转型前夜的社会,新旧力量矛盾冲突异常尖锐,其时的社会发展路向固然受到诸多社会因素制约,执政者的决策与运作作为把握方向的能动的变量,显然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主导作用。与欧洲新兴资产阶级颠覆旧结构以及俄、日通过调整改革相继跨入工业文明轨道的模式不同,清朝采取了修补复制旧结构的对策。

明清局部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雏形的萌发生长,比许多前现代国家都更为充分,对传统的农耕经济产生了猛烈冲击。社会上相应提出“工商皆本”主张,标榜“行商坐贾,治

① 李乐:《见闻什记》。

②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

③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生之道最重也”^①，“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②。清前期的赋税改制曾对商品经济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面对“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逐末之人多”日益高涨的潮流，统治者却固守“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③的旧辙，用强制摊派、低价征购、苛税盘剥打压民间手工业、商业，致使“客商畏惮征求，多致卖船弃业”^④。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资本集聚扩大再生产、开展远程贸易风险极大，一些商业资本转而投入寄生性更强的“食租衣税”土地剥削，从而极大限制了新生产关系的辐射力，阻断了大规模工业城市化和城市工业化的变革。与此同时，因实施禁海政策和官府垄断贡赐贸易，失去了利用国际贸易优势地位开辟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

解决人口剧增问题的政策取向是制约清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另一重要因素。清代人口迅速膨胀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圣世滋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初年取消人头税有直接关系。康熙时期已经意识到“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⑤的压力，乾隆朝进士洪亮吉在《意言》书中认为人口过剩是社会贫困和动乱的原因，有可能因“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调剂之法”而缓解，其时节育知识业已在江南地区民间普及^⑥，道光朝举人汪士铎《乙丙日记》就曾提出“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以抑制人口增长，清廷本来完全可以通过调整赋税加以控制，而且倘能积极倡导工商业、拓展新的生产领域，人口问题还远未达到极限；结果却采用“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使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⑦的方略应对。这种把大量过剩劳力控制在有限耕地之内的高度密集型经营模式，大大削弱了开发非生命动力能源和科技创新的驱动力。成本低廉的“男耕女织”家庭生产结构愈趋坚固，阻碍了手工工场生产的扩展。清代生产总量有所提高，劳动效率却不见增长，人均产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虽然尚能维系庞大帝国运转，但却更加凝固、强化了农耕自然经济形态。

魏晋南北朝之后门阀衰微，至宋已是“谱牒废弛，人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⑧，租佃关系发展，乡绅阶层与民间社会逐渐发育。明清统治者为加强专制集权再度祭起宗族血缘大纛，用三纲五常重建宗族血缘网络，通过立庙联宗、尊祖收族，“移孝作忠”，控制族众。一些族规家法每每规定每年定量配给族妇原料、限定产量，“俱令亲自纺绩，不许雇人”^⑨，“丈夫衣服妇自供，儿女衣服母自供”^⑩。一族所居“动辄数百或数十里，即在城中者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以故千百年犹一日之亲，千百世犹一父之子。”^⑪这种“保甲为经，

① 冯应京：《月令广义》卷二。

② 王夫之：《黄书·大正第六》。

③ 《清世宗实录》卷五七。

④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杂税部》。

⑤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⑥ 参见李伯重：《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

⑦ 《清世宗实录》卷五七、卷一六。

⑧ 张载：《张子全书·宗法》。

⑨ 《庞氏家训·考岁用》。

⑩ 《蔡涪家训》。

⑪ 光绪《石塘桂氏宗谱》卷一。

宗族为纬”^① 编织成的巨大潜网,将广大农村自然经济和乡土宗族血缘纽带高度胶合强化,“人心维系,磐固而不动”^②,形成混凝土结构,使社会凝固板结,阻滞着社会结构的更新变革。

明清时期的教育水准为培养工业社会所需新型生产者 and 组织生产、行政管理、科学技术等高级人材,提供了良好的起点。事实上,唐代即已有算学、医学、律学等专科学校,开办自然科学方面的专科学校比欧洲早一千年。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分别为法国大革命 1791 年以及英国 1855 年推行选拔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但明清时期因经济层面工业化步伐滞后和官府热衷于教化的导向,一直未能发展起适应近代企业、商贸、金融、法律、航海等需要的专门技术学校。按理通过调整科举考试内容控制精英教育导向并不困难,北宋熙宁八年,神宗即曾颁王安石《三经新义》于学官,取代先儒对经籍的传注,贬抑诗赋,重视策论,大力为推行变法培养选拔人才。明末宋应星曾提出儿童时期即应学习自然科学。康熙年间颜元痛斥“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在他主持的漳南书院将数学、天文、机械等艺能与文事、武备、经史一并列入学规章程,分科立教,以培养造就经济实用人才。^③ 但在晚明“经世致用”学风盛起和西学东渐之后,清廷仍未注入科技实学新知识,继续八股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并以朱熹集注为依据,“代圣贤立言”。非但未能利用统一、规范、高效率的教育选拔机制为促进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开路;反而脱离社会发展大势,顽固复制旧官僚、旧体制,严重阻碍近现代进程。

科技创新是推进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巨大动力。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文中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三大发明的故乡,这方面的资源自属丰厚。就技术层面来看,欧洲纺织机器发明前,“要找一个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织工人,并不比找一个双头人容易”^④。而在 14 世纪初元代劳动妇女黄道婆手中,已经能够同时纺出三根纱来。16 世纪发展起来的实验科学所拥有的典型“近代”内容,“均与中国人的观念(磁学、力场概念、微粒旋转论、波传动论、组合逻辑、有机整体和机体自动调节论……)相吻合,而它们都曾是西方传统中所缺乏的内容”^⑤。李时珍取得巨大成就,得力于“访采四方”,亲自勘察、口尝、解剖试验;徐霞客“造域穷奥”,必“身历综校之”,1953 年中国科学院复查他当年踏勘的 15 个溶洞,所得数据大体相符;朱载堉构筑的音律体系建立在精密计算的基础之上;宋应星记述工农业生产关键技术和操作要点,必先亲自实践体会,他对生产器具和产品长、宽、高、深、重量、容积、比率等技术指标的统计测定,无一不是运用数量、比重等数学、物理方法“穷究试验”的结果。在这些科学巨匠中间体现的摒弃科举功名,乃至辞王让爵献身科学的价值取向和重视实验的科学态度,“理由数显,数自理出”^⑥ 注重数理的科学方法,已显露出近代科学研究的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复宗法议》。

② 《庐江章氏义庄记》。

③ 《颜元集·年谱》。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450 页。

⑤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 459 页。

⑥ 朱载堉:《进历书奏疏》。

特点。入清后,康熙帝虽然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曾组织编纂《律历渊源》、测绘《皇舆全览图》,但却未能在政策和制度上鼓励发明创造,不能和生产实践结合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雍乾时期更每况愈下,非但不复涌现世界级科学巨匠,甚至晚明已经取得的科学成就也被长期埋没,不甚了了。正是在18世纪下半叶,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等科技发明引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在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带动生产方式更新和商业贸易、交通运输、海外殖民迅速发展,在不足百年的时间把清帝国远远甩在后面。中西之间发生这次根本性逆转,实非偶然。密集型农耕模式对扩大再生产、开发新能源、新材料和改革工艺需求的抑制以及文化专制、八股取士文化教育选官政策的控导,是刺伤清代科学技术的致命毒刺。

明中后期工业文明因素的发育,许多方面比欧洲、日、俄等国更为优越,不过向工业文明转轨属于总体结构性变迁,“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①。明清高度成熟的农耕母体具有极富韧性的自我整合机制,不断包容扭曲涵化异质变革因素、修补完善自身的体制,成为桎梏近代化因素发展的巨大障碍。商品流通在欧洲是冲击自给自足庄园经济的革命因素;但在中国,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一定程度上是对个体自然经济的补充。黄金暴利是锻造西欧重商精神、驱使殖民扩张的魔咒,金钱钝化了封建武士的佩刀;中国金钱则被引导买田大量回流土地,淹没在农耕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欧洲城市急剧扩大,成为孕育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摇篮;中国大城市则是专制集权统治的政治、军事中心,经济上则以官办手工业为主,为统治阶级享乐消费服务。欧洲的工商阶层是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和部分贵族转化而来的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中国官僚、地主、商人之间固然能够流动,但却因此促使三者融合,转而凝聚、巩固传统农耕体制。所谓“高度平衡的陷阱”并不仅只表现在经济层面,高度成熟的农耕体制有效地维系着传统的运行轨道,突破产业革命的瓶颈格外艰难。

“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②清前期诸帝不失为精明勤政的有为君主,清政权在治河、修路、抗灾赈济以及维系国家稳定等重大活动中也显示出了非凡的组织控制能力。问题在于清前期治国者并未顺应工业文明萌动的趋向,积极调动有利资源革新进取;而是立足于承袭两千多年农耕文明运势的惯习“持盈保泰”。为维护满族贵族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专制集权体制极度膨胀,厉行文字狱更导致“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局面,使政治层面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因素难以发育,在遏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成长,阻碍社会变革等方面带来严重恶果。

明清时期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正当西方列强近乎疯狂地越洋抢滩开辟市场拓展殖民地之际,清统治者却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③,作茧自缚,全面退缩。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也曾提供打开视野、融入工业文明潮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00页。

③ 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三。

的机遇。明末徐光启不失时宜地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①，通过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赶超西方的主张。清统治者则只留意历法、火器、地理等局部器用层面，固守华夷之分、西学中源的千年古调，最终随着雍正年间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而中断中西文化往来。清朝闭关自守的消极防御对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抵挡住殖民势力侵略；反而进一步导致闭塞、停滞、倒退，更加远离世界潮流。

农耕文明的辉煌毕竟远远不能和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的巨大飞跃相比。早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康乾盛世顶峰，中西兴衰易位的大局便已铸定。乾隆末年承平日久后必然要出现的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等周期性痼疾再次复发，至跌入衰败低谷的清中期，遂如道光帝所感叹的：“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③自明中后期以降两个多世纪，距康乾盛世仅一百来年的时间，便陡然发生天翻地覆的逆转，这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较量的必然结局。

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从全球整体互动的恢弘视野出发，论证1500年甚至更早早已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西方的兴起是站在亚洲肩膀上，“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车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上的位置”。弗兰克强调应把欧亚兴衰放置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中考察，无疑极有见地^④。新航路的开辟确实引起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⑤。但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动并不能完全决定生产关系的选择和变革。明初郑和下西洋早于哥伦布、达·伽马远航近一个世纪，舰队规模也远较后者庞大，但因其贡赐贸易的性质，输出商品多采自官府督造和低价强征硬派，“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⑥最终被视为弊政而遭废止，成为绝响。而西方远航则为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推进海外殖民迅猛发展。人们不应忽略，在西方称霸海外的同时，其社会内部经历了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取代手工作坊、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君主贵族特权、人的理性冲破中世纪神学禁锢、科学战胜蒙昧等一系列深刻变革，并通过产业革命向工业文明转轨。因此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利用亚洲建立的世界经济网络进一步拓展飞跃，最终用新式蒸汽机火车取代亚洲古旧马车而迅速崛起。

明清帝国从全球经济中心地位退出并迅即衰败同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长时段结构性负面因素自然会对社会转型，包括治国者的政策导向产生制约；但商品流通孕育出的新经济因素也分明为政策调整提供了余地，如明中期的改革即系“天下有不得一条鞭之势，张江陵

① 《明史·徐光启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③ 《史料旬刊》第23期，第844页。

④ 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2页。

⑥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不过因势而行之”^①，即使清统治者倒行逆施也不能完全遏制市镇经济的活力。本文论述“鼎盛”、“成熟”与“障碍”、“殒落”时分别列举的一些事例，表面上互相矛盾；其实正是新旧交织革故鼎新时期主文化与亚文化、反文化对立统一格局的真实显现，也是日后此消彼长优劣地位转换、社会变革飞跃的内在依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轨道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并非所有地理单元的部族、民族都能单独跨入文明门槛或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也并不只限于资本主义道路一途。美国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原工业化理论，把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前由市镇资本控制、为市场生产的农村家庭工业视为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认为原工业化是欧洲前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具有向工业化过渡的必然性。也有学者认为这并非普遍现象，而且即使是“与中国情况最为相类的欧洲原工业的动力，也并不一定会导向19世纪的工业化”，并告诫中国史学家们，“不应再继续寻求那种使明清经济发展不能变成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东西”^②。应该承认，中欧、东欧乃至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原工业化，确实未能或未及像英国那样顺利跨入工业化轨道而分别呈现某种相对缓慢发展、停滞甚且解体状态，不过“原工业化”只是经济领域生产力、生产关系范畴的概念，不能涵盖驱动工业化的其他因素；而且该概念主要指包买商控制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不能反映中国明清时期市镇经济劳动组合的主体形式。一些学者在肯定明清江南并没有出现人口压力加剧，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下降，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年增长率远远高于整个欧洲地区，明清江南地区经济还具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情况下，仍然认为推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是“斯密动力”(即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在所导致的“斯密型成长”中，经济总量、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但技术变化不大，因而无法导致近代工业化。而且由于缺乏煤、铁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③。但在笔者看来，并没有证据表明江南地区永远不可能实现技术突破，而且诚如这些学者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江南地区完全有可能通过内河、近海航运从华北、东北、汉口输入煤、铁资源发展起具有一定规模的重工业^④，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南粮北调的先例，对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清朝，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而且恰恰能够因煤铁南运东输而刺激交通运输、国内市场并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是比工业化更为宽泛的全方位概念，即指从产业革命开始的使人类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技术和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而近代化则是指产业革命的准备阶段和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过渡阶段。本文考察揭示的明中后期至清鸦片战争前诸项工业文明重要指标状况表明，中国注定不能自行进入工业文明的结论尚难成立。当然，断言清前期中国社会近代化变革“缓慢的”、“凝重的”、“持续而不间断的进步”，正是“我们民族历史独有的特色和风貌”^⑤，也显失偏颇。结构性因素在中长时段制约着社会发展路向，国家政权的文化选择则在中短时段成为影响转型成败至关重要的因素。

① 《清经世文编》卷二九。

②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45页。

③ 参阅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④ 参阅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高翔：《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既然明中后期业已萌动工业文明的趋向,甚至“在很多方面,中国非常具备现代转变的条件”^①,而且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亦曾提出相应革新的主张;影响社会转型的主要症结便取决于治国者的应对方略。只消把同为17、18世纪之交风云人物康熙皇帝、法王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三者的施政方针稍加比较,便可对导致三国日后发展走向与成败兴衰差异的原因一目了然。法王路易十四于1665年重用宠臣柯尔伯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改革;彼得大帝亲自化装到西欧实地考察,大刀阔斧革新;而玄烨及其继任者却盲目宣扬“西学实源于中法”^②,热衷于复兴宋明理学,全力守护“重本抑末”的农耕藩篱。公平地说,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为执政者的“文化”选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清统治者愚昧自大、封闭锁国、拒绝开放、顽固推行强化农耕体制、修补复制传统结构的“重农主义”举措,限制了近代化因素的发展,坐失向工业文明转轨的良机,甚至使个别工业文明因素某种程度萎缩乃至断流,最终导致帝国迅速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殒落。

(作者曹大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于沛)

(责任校对:刘军)

本刊重要启事

1. 为了进一步提高编辑、排版、录入、校对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本刊全部采用e-mail投稿。e-mail投稿信箱:sxllj@sina.com

2. 凡论文投稿者(书评除外),请在文章的前面写出200字的中文提要及关键词(外国史的稿件请写出英文提要或关键词的英文原文)。

3. 注释请一律采用脚注;作者介绍请写出姓名、职称、电话和邮政编码,以便联系。

① 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271页。

② 梅文鼎:《续学堂诗抄》卷四。

作者: [曹大为](#)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刊名: [史学理论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HISTORIOGRAPHY QUARTERLY](#)
年, 卷(期): 2002 (4)
被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86条)

1. [明神宗实录](#)
2. [胡琢 濮镇纪闻](#)
3. [万历秀水县志·市镇](#)
4.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
5. [乾隆<湖州府志>](#)
6. [濮镇纪闻](#)
7. [铅书·食货](#)
8. [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
9. [孙承 春明梦余录·钱法议](#)
10. [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
11. [叶梦珠 阅世编](#)
12. [谢肇淛 五杂俎](#)
13. [王世懋 闽部疏](#)
14. [陆尚宝遗文·友松胡翁墓志铭](#)
15. [王世懋 二酉委谭摘录](#)
16. [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
17. [光绪嘉定县志](#)
18. [续文献通考·征榷考](#)
19. [明经世文编](#)
20. [庞尚鹏 清理盐法疏](#)
21. [谢和耐;耿昇 中国社会史](#) 1995
22. [<隆庆实录>卷七](#)
23. [顾准文集](#) 1994
2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
25. [马克思 资本论](#) 1975
26. [蓝浦 <景德镇陶录>卷八](#)
27. [宋应星 天工开物·陶土延](#)
28. [江西通志](#)
29. [马克思 资本论](#)
30. [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 1995
31. [明神宗实录](#)

32. [明神宗实录](#)
33. [袁宗道 <白书斋类集>卷二二](#)
34.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
35. [王夫之 读四书大全说](#)
36. [李贽 <明灯道古录>卷上](#)
37. [李贽 焚书](#)
38.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原臣](#)
39. [明夷待访录·原法](#)
40. [明夷待访录·学校](#)
41. [顾炎武 日知录·爱百姓故刑罚中](#)
42. [本草纲目@凡例](#)
43. [戴念祖 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 1986
4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 1976
45. [歙县志·风土论](#)
46. [西安县志](#)
47. [朱载堉 山坡羊@钱是好汉](#)
48. [傅山 圣人为恶篇](#)
49. [<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 刘于义奏折](#)
50. [任袁萃 林居漫录](#)
51. [李乐 见闻什记](#)
52.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
53. [许涤新;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1965
54. [冯应京 月令广义](#)
55. [王夫之 黄书·大正第六](#)
56. [清世宗实录](#)
57.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杂税部](#)
58. [清圣祖实录](#)
59. [李伯重 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 2000(01)
60. [清世宗实录](#)
61. [张载 张子全书·宗法](#)
62. [庞氏家训·考岁用](#)
63. [霍渭崖家训](#)
64. [光绪石埭桂氏宗谱](#)
65.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复宗法议](#)
66. [庐江章氏义庄记](#)
67. [颜元集·年谱](#)
68. [马克思 资本论](#)
69.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70. [朱载堉 进历书奏疏](#)
7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7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73. [梁廷枏 粤海关志](#)
74. [明史·徐光启传](#)
7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76. [查看详情](#)
77. [弗兰克;刘北成 白银资本](#) 2000
78. [马克思 资本论](#)
79. [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卷八](#)
80. [清经世文编](#)
81. [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82. [李伯重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刊论文]-[历史研究](#) 2001(1)
83. [李伯重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刊论文]-[历史研究](#) 2001(1)
84. [高翔 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2000(04)
85. [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
86. [梅文鼎 <绩学堂诗抄>卷四](#)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 [向安强. 刘桂娥 岭南史前稻作农耕文化述论](#)[期刊论文]-[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4)
2. [文建虎 湖湘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期刊论文]-[档案时空](#)2008(1)
3. [李根蟠 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制约——与战国秦汉和唐宋时期的比较](#)[期刊论文]-[河北学刊](#)2003, 23(2)
4. [樊志民. 朱宏斌 秦军事地理变迁与秦农业地域拓展](#)[期刊论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1(1)
5. [曹沛 中国自明清以来衰落的文化根源——兼谈中西文化中理性的自负](#)[期刊论文]-[青年作家\(下半月中外文艺版\)](#) 2010(12)
6. [陈万祥. Yang Jinlong. Chen Wanxiang. Yang Jinlong 甘薯生产的现状及开发利用的途径](#)[期刊论文]-[农业装备技术](#)2008, 34(4)
7. [徐亦亭 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首领](#)[期刊论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22(5)
8. [徐幼萍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双重效应](#)[期刊论文]-[文教资料](#)2008(11)
9. [葛金芳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思考](#)[期刊论文]-[史学集刊](#)2006(1)
10. [杨镇毓. YANG Zhen-yu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期刊论文]-[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7(5)

引证文献(2条)

1. [易海风 新世纪以来中国农耕文明研究的回顾](#)[期刊论文]-[广东农业科学](#) 2011(03)
2. [潘忠丽 明中后期市镇消费文化探析——以《金瓶梅》等世情小说为中心](#)[学位论文]硕士 2007

引用本文格式：[曹大为 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期刊论文]-[史学理论研究](#) 2002(4)